

# 文本的双轴主导与伴随文本的类型

谭光辉

(四川师范大学, 四川 成都 610101)

**摘 要:**伴随文本是一个在“文本间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概念。重新整合伴随文本的类型,将其放入聚合文本和组合文本两个范畴之中,删减或扩展部分类型,可以发现组合文本与聚合文本两者可以互相转化。提出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是为叙述建立一个区隔框架。区隔框架是一个由各种伴随文本围合而成的作者与读者共在的世界,它的闭合与展开,致使虚构世界与实在世界在交融中不断互相充实,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关键词:**伴随文本;聚合文本;组合文本;区隔框架

**中图分类号:**I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5)7-036-041

DOI:10.13713/j.cnki.cssci.2015.07.006

## 一、伴随文本的观念史

伴随文本的观念一般被追溯到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概念,国内对该概念的另一种译法是“互文性”。然而这一观念已经被艾伦(Allen)追溯到了索绪尔(Saussure)和巴赫金(Bakhtin)。艾伦认为,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是克里斯蒂娃理论的两个来源,索绪尔揭示了词语间的关系,巴赫金揭示了社会词语间的关系。<sup>[1]8-21</sup>后来的巴尔特(Balthes)正是在索绪尔、巴赫金、克里斯蒂娃等人的理论的启发下宣布作者死亡的,作者的话语并不源于自己独一无二的意识,而是源于他所处的语言—文化系统,是对语言系统中先前存在的可能性的编辑和安排<sup>[1]14</sup>。巴尔特的“开放文本”(unbound text)、热奈特(Genette)的“跨文本关系”(transtextuality)、副文本(paratextuality)、超文本(hypertextuality)、型文本(archi-text)等都是对这一概念的补充和细化。里法泰尔(Riffaterre)的结构主义解释学,布鲁姆(Bloom)、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及后现代主义都受它影响并对它起到了重

要的推动作用。

海沃德(Hayward)给“互文”的定义非常简洁:互文就是“一个文本指涉其他文本,文本之间相互交织”。<sup>[2]276</sup>为什么需要这个概念呢?沃顿(Worton)列举了两条理由:第一是作者在成为一个文本创造者之前首先是个读者,因此他创作的艺术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参考书、引文等各方面的影响;第二是因为文本只有通过阅读过程才能被获得,阅读时生成的文本受到成套文本材料的交互影响。<sup>[3]1</sup>事实上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任何文本不可能独立存在,恰如一个人不可能单独存在于世一样。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才把人定义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文本,也是一切文本间性的总和。克里斯蒂娃提出此概念,是对新批评的文本中心主义的反思,并不意味着在她之前就不存在这个观念。张智庭在研究巴尔特的互文性概念的时候认为:“我国很早就有‘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和‘借古讽今’等成语的存在,它们已经概括了‘互文性’的最基本意义”。事实上,借互文性展开文学批评是比克里斯蒂娃更早的文学批评的核心方法。孟子强调“知人论

作者简介:谭光辉,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符号学、叙述学。

世”，刘勰强调“原道”、“征圣”、“宗经”，桐城派重视“义理、考据、辞章”三位一体，都是在说文本的相互依存关系，只不过以前没有系统的整理和术语。

洛特曼(Lotman)的“符号域”(Serniosphere)理论进一步扩展了文本间性概念，将其应用于所有的符号及符号文本之中。特洛普(Torop)认为，“‘符号域’这个概念使文化符号学将文化‘整体主义’上升到了新的认识高度，并且成为了分析文化动态过程的一种‘整体分析’方法论”。库尔(Kull)也说：“符号域是质性上的多样性的所在”。符号域理论可以看作对文本间性理论的扩展与应用。

经过几代理论家的不懈努力，文本间性这一概念不仅深入人心，而且成为后现代思想的来源。在索绪尔那里，语言符号并不简单地指任意性，也指差异性。而一旦涉及差异性，就必然带出与之存在差异的那部分概念，这正是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一个来源。后来，这一思想发展为“去中心化文本”(the de-centered text)。去中心化文本观念只关注文本与文本之间产生的意义，相当于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整个文化领域。然而，如果文本失去了中心地位，意义便有可能失去一个附着点，因此范尼尼(Vannini)在继巴尔特1968年宣布“作者死亡”之后，于2006年宣布“作者第二次归来”<sup>[4]</sup>，王立新在2011年也在对《百家讲坛》的研究后宣布“作者归来”，又有提醒我们不要过分夸大文本间性概念的意图。文本间性的观念是新批评提出的文本中心主义观念的对立面，严重提醒我们除了关注文本本身之外，不要忘记文本所处的外部环境因素，而文本的意义解释，根本就无法与这个外部环境割断联系，文本不可能单独成为文本，但是该观念的作用不宜被过分夸大。

虽然文本间性的概念被关注得很多，但是西方学界通常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使用的。赵毅衡认为，“‘文本间性’这个重要理论，经常过分笼统，需要进一步细化。”<sup>[5]143</sup> 鉴于此，他将“文本间性”重新命名为“伴随文本”，重新规定其内涵和外延并做了成规模的细化。伴随文本指那些“伴随着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这些成分伴随着符号文本，隐藏于文本之后、文本之外，或文本边缘，却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构成，严重地影响意义解释。”<sup>[5]143</sup> 赵毅衡的分类方案是：显性伴随文本，包括副文本(para-text)和型文本(archi-text)；生成性伴随文本，包括前文本(pre-text)和同时文本；解释性伴随文本，包括元文本

(meta-text，为防混淆，后来改为“评论文本”commenting-text)、链文本(link-text)和先文本/后文本(receding/ensuing text)<sup>[5]144-152</sup>。赵毅衡在2010年将这个分类归纳为六类：类文本(框架因素)，型文本(类型因素)，前文本(引用因素)，元文本(评论因素)，超文本(链接因素)，次文本(续写因素)，说明了该分类所属的领域。这个分类可能导致某些交叉情况，所以李玮、蒋晓丽对此提出了修正意见，认为“还有待厘清的是‘元文本’，还需深化的是‘前文本’，还可以扩展的是‘链文本’。”

分类的目的决定了分类的方法和结果。莫利希在给非洲语言分类的时候提出一个类似的想法：“和大部分专家的看法相反，我想应该是语言分类的目的决定分类模式的选择<sup>[16]</sup>。事实上任何一个分类都是如此。由于伴随文本与意义解释密切相关，至少还可以为真实性/虚假性、纪实性/虚构性的判断提供依据，所以是任何文本研究不可绕开的部分。厘清各种伴随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是叙述学必须直面的重要任务。尝试分类的目的，是厘清文本内与文本外的因素，将伴随文本与文本的关系放置于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试图将它们纳入一个新的框架中重新整理。

## 二、组合文本与聚合文本 区分的学理依据

艾伦在《文本间性》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索绪尔理论中的组合轴/结合轴(syntagmatic/ combinatory)和聚合轴/选择轴(paradigmatic/ selection)这一组核心概念。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把这两个概念分别叫做“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索绪尔认为，句段的概念“不仅适用于词，而且适用于词的组合，适用于各式各样的复杂单位(复合词、派生词、句子成分、整个句子)”<sup>[7]172</sup>。由于语言学研究到句子为止，所以索绪尔没有对这两个概念进一步扩展。对联想关系的解释，范围更窄，讨论集中在“词”的层面：“任何一个词都可以在人们的记忆里唤起一切可能跟它有这种或那种联系的词”，它的特征是“联想集合里的各项要素既没有一定的数目，又没有确定的顺序”<sup>[7]175</sup>。索绪尔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对结构主义思想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多位学者对此概念加以引申和运用。后来的符号学家将其改称为聚合轴(paradigmatic)和组合轴(syntagmatic)。20世纪50年代，雅各布森(Jakobson)将这一组概念称作结合

轴(axis of combination)和选择轴(axis of selection)。雅各布森用该理论解释隐喻和转喻,成为符号学研究中的经典案例。事实上,不论这个术语叫什么名字,其核心内涵并没有改变。最重要的变化是该术语的应用范围在扩大。雅各布森不但用此理论解释隐喻和转喻(核心观念是:隐喻是聚合轴操作,转喻是组合轴操作),而且将其应用于其他许多领域,例如失语症、儿童语言习得、文学、绘画史与艺术运动、民间故事乃至婚礼歌曲,等等。虽然学界不乏用此思维方式分析文本的案例,但是至今没有人提出“组合文本”和“聚合文本”的概念,似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阻止了研究对象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赵毅衡按此思路推进,在理解底本/述本(fabula/sjuzhet)这一组概念的时候,将述本理解为“文本组合”,将底本理解为“叙述操作所形成的聚合背景,是叙述的‘备选组合相关元素’”<sup>[8]130</sup>。从学界的观念模式变化来看,聚合与组合的观念已经从索绪尔的到句子为止扩展到文本,它有待被进一步扩展到文化范围。简而言之,任何一定视域范围内的文化都可在观念上被整合为一个文本,凡是进入这个大的文化文本的元素,都存在于组合轴,没有进入但可能进入这个文化文本的元素,就存在于聚合轴上。因此,文化文本的形成,也同时是组合操作和聚合操作的结果。

由于伴随文本是“伴随着符号文本一道发送给接收者的附加因素”,所以伴随文本就是存在于聚合轴上的所有因素。又由于文本概念可以在观念上不断扩展,所以现实化了的聚合文本又可以存在于扩展文本的组合轴上。组合文本就是一个可以不断汲取聚合文本的元素从而不断增长的文本。由聚合轴上的元素扩展转化而成的文本扩展部分,是组合文本,未现身的部分,为聚合文本。

有理由相信,一个文化中的各个组分,都可能互为伴随文本,只不过有的伴随文本隔得近,有的隔得远而已。“拔出萝卜带出泥”,看到泥,就可知萝卜已经被拔了。发现一个化石,可能还原一个时期的生态环境;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复原了一个古蜀国的文明。这类考古发现研究,基本上都可以看作对伴随文本的还原式研究。因为伴随文本和文本总是同时出现在文本之中,所以“所有符号文本,都是文本与伴随文本的结合体”,赵毅衡将这种现象称为“全文本”。“全文本”是组合文本和聚合文本的结合体,其中也包括文本本身。

### 三、各类伴随文本在组合文本和聚合文本中的存在方式

上文给伴随文本划分出两种类型:聚合型和组合型。但是,这两类伴随文本都可能包含赵毅衡所举的伴随文本的各个类型。聚合型和组合型的划分是一种动态的划分方式,某个伴随文本被纳入哪一个类型,取决于观察者的目的。

副文本(paratext)是文本的框架因素,包括处于文本边缘的各种显性文本,例如标题、作者、序言、插图、装帧,等等。热奈特认为这些文本极少单独出现,只是正文的补充和伴随物,人们常常不知道是否应该将它们看作文本的一部分,但无论怎样,这些文本包围并延伸了文本,准确地说是呈现了文本。朱桃香从热奈特的观点出发认为,“副文本实际上包围并延长了文本,并在其中充当结构成分”。金宏宇也据此认为,副文本既是正文本的互文本,又是整个文本的构成部分,它既可能有多重价值,又可能对正文本产生遮蔽、拆解乃至颠覆的效用。如果将热奈特的“延伸文本”作为比喻使用,大约没有什么不可,但从框架结构方面看,就存在问题。如果将副文本看作文本的一部分,那么副文本的概念就被消解了。如朱桃香所言,热奈特将副文本比喻为“门槛”,博尔赫斯比喻成“门厅”,勒热纳比喻为“门轴”,该区域是过渡区或交易区,那么副文本就不可能是正文的一部分。如果看作一部分,那么它就不能再叫副文本。本文认为,既然副文本是框架因素,那么它就不可能处于文本内部的组合轴上,而是处于聚合轴上。副文本围成一个关于文本的框架,它与文本就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副文本与文本的关系,常常可以直接作为判断文本的纪实性/虚构性的依据。所以通常意义上的副文本并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属于框架因素,例如作者、序言、题词、封面等,处于文本聚合轴上;有的属于文本,例如和内容有关的插图、伪装为序言的元叙述、延伸了文本内容的后记等,处于文本组合轴上。只有处于文本之外的文本框架,才属于副文本。

以此观之,热奈特将插图都看作副文本,就存在重大的问题,而且对后来学者产生了误导性影响。例如金宏宇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时,就将所有的图像都算成副文本,其中包括封面画、插图、照片等<sup>[9]107</sup>,这大约是文字文本中心主义的产物。按此理解推进的话,连环画、漫画、卡通画的图片都得算成副文本。事实上我们非常清

楚,漫画甚至可以没有文字说明,图像就是文本。为了说明一个历史真相,可以采用大量的照片,甚至可以不用文字说明,这些照也是文本,而不是副文本。艾克须佩里的《小王子》里面有不少插画,不用这些画的话,用文字根本就说不清楚问题,比如开篇就写的那个吞下大象的莽蛇又像一个帽子的画。所以,不能把所有插图都称为副文本,然后又笼统地说副文本处于文本之外,又是文本结构的一部分。

型文本(architext)是文本的类型因素,主要是指文本的体裁、风格、题材类型等。热奈特1979年出版的《型文本导论》(The Architext: An introduction)讨论了型文本的发展史,基本上都在讨论体裁变迁,而体裁又总是与风格联系在一起。热奈特认为,型文本因素变化最小,但仍然坚持认为,是历史主义杀死了历史,关于变迁的研究意味着并且要考虑到接受持续不断的检验,历史过程明显没有被决定,但是却最大程度上的受到组合图表导航灯的指引。布尔乔亚时代之前,布尔乔亚戏剧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现在却可以正好圆满地将它定义为英雄喜剧的反面<sup>[10]79</sup>。他的意思是说,型文本是历史的,而且是被建构起来的。按说,型文本是一个嵌合在文本之中的类型框架,也应属于副文本的一个特殊类型,只不过该副文本是隐在的、间接的,需要一个抽象分析。在元小说中,这个隐在的因素可以被元叙述呈现出来,所以它又可以是显在的。当型文本被视为内嵌因素的时候,应该将其看作组合文本。当它呈现出来的时候,应该将其视为聚合文本,因为当它出现在文本中的时候,反而暗示了它的其他可能。

前文本(pre-text)是文本的引用因素,“是一个文化中先前的文本对此文本生成产生的影响”<sup>[5]147</sup>。没有一个文化语境积累,不可能产生一个叙述文本。威多森(Widdowson)区别了上下文语境文本(context)、联合文本(co-text)和前文本(pretext)三个概念<sup>[11]36-88</sup>,事实上这三个概念的区别主要在于对原始文本概念大小的界定。法国批评家德比亚齐(Be Biasi)则把前文本定义为“一组毫无科学根据的资料经过整理后变成有序和有意义的材料”,主要指根据“作品的手稿”整理成的“已成为可解释的起源材料”<sup>[12]29-30</sup>。当然,这是从具体、现实的层面来谈的,从抽象的层面来看,作家写作过程中想到过而又被抛弃的想法,都可以视为前文本。从文化层面来看,作家必然是在对杂乱的文化材料进行组织的基础上进行文本创作

的,那么作家的整个知识背景,都是该文本的前文本。从这个意义上看,先文本必然是后文本的知识背景,所以应该归入前文本。前文本也可以分别在聚合轴和组合轴上呈现。进入了文本之中的文化材料,应视为组合文本,例如引用、典故、抄袭、剽窃,这些材料已经成为文本的一部分;没有进入文本的引申义、暗示、未用的草稿、影射对象、知识背景等,应视为聚合文本。

中国古代小说喜欢用“有诗为证”,看起来像是引用以前的文本,其实大多数是作者自己写的,也有少数确实是引用。如果我们就无法区分哪些是真引用,哪些是假引用,比较方便的策略就是将这些引用都统一视为组合文本,因为这些诗词其实本就是文本的一部分。但是,无论真引还是假引,都在聚合轴上带出了诗词文化,诗词文化是前文本,出现在小说中的诗词是文本的一部分,是组合文本。

后文本(ensuing text)是文本的续写因素或次生因素。后文本也可看作文本被续写、改写的各种可能的现实化。被引用的文本是前文本,引用的文本就是后文本。续写本、改写本是直接的后文本,受影响的文本是间接后文本,前后文本之间就是引用和被引用、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后文本包括那个引用、剽窃、抄袭了其他文本的文本,它与前文本互为存在条件。任何文本必然引用之前的文化因素,又可以进入文化系统被后来的文本引用,成为文化背景。洛特曼因此认为,“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是文本创造了语境,包括所有在传播行为中的参与者”。因此,前、后文本是一种具有相对性和变化性的文本概念。如果文本产生之前的整个文化语境可以视为前文本,那么该文化将要产生的所有文本都可以视为这个文化文本的后文本。文化的发展,就是不断产生后文本的过程。由于后文本不可能存在于文本之中,所以后文本只能存在于聚合文本之中。

有些文本(特别回旋跨层类小说)在文本之中为自己设置后文本,然而这个设置的后文本仍然只能看作文本的一部分。例如《堂吉诃德》前八章由一个叙述者讲述,到第八章结尾突然宣布“作者把一场厮杀半中间截断了,推说堂吉诃德生平事迹的记载只有这么一点。”然后又宣布:“当然,这部故事的第二位作者决不信这样一部奇书会被人遗忘”,“因此他并不死心,还想找到这部趣史的结局。靠天保佑,他居然找到了”<sup>[13]61</sup>。这样就把第二部当作了第一部的后文本。然而,我们明白,这

只是作者玩的一个叙述游戏,第八章前与第八章后的文本,仍然是同一个文本。

评论文本(comment-text)是文本的评论因素,主要指出现在作品之后的所有“有关此作品及其作者的新闻、评论、八卦、传闻、指责、道德或政治标签等等”<sup>[5]148</sup>。评论文本不可能存在于作品之中,所以不可能是组合文本,只可能是聚合文本。我们可以把评论文本看作一种特殊的后文本,这种后文本不直接处理文本内容,而是处理文本的元层次。评论文本甚至不是直接的伴随文本,而是关于文本和伴随文本的解释。部分文本的“元文本”层次也是评论文本。波波维奇(Popovic)认为文学的“元传播”(meta-communication)发生在元文本读者和如下主体之间:其他作家、翻译者、文学批评家、文学学者、读者。元文本是对原始文本(prototext)的模仿,方法是连接两个文本,模仿规则是让元文本作者的文本组织活动现实化<sup>[14]</sup>。聚合文本中的成分可以通过进入组合文本的方式变成文化中的现实。

评论文本也是一个随历史变化而变化的文本,它随着评论因素的增加而不断增值。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的发展方式,正是通过评论文本增值的方式积累起来的。评论文本包括所有谈论该文本的叙述层和内容层的文本,例如作家传记中描写作家如何创作该文本的部分。评论文本处于文本之外,也被元小说安排在文本之内。被安排在文本之内的应视为组合文本,处于文本之外的则是聚合文本。

链文本(link-text)是文本的链接因素,可理解为与文本有联想关系的所有相关文本。链文本的链接原因可能是上述伴随文本中的任一类型。例如,通过副文本链接:同一出版社出版的其他文本、同一标题或类似标题下的不同文本(例如朱自清和俞平伯的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等等;通过型文本链接:某一类型、风格、流派、题材、体裁的其他作品,等等;通过前文本链接:某文本产生之前的文化史、历史背景、手稿等相关资料等;通过后文本链接:一部作品的所有续集、续书、改编、引用文本等;通过评论文本链接:该文本的评论、报道、八卦等。链文本并不一定是解释文本,而是有助于解释的文本,所以“广义的链文本构成了文本接收时所面临的全部文化语境”。链文本只能处于文本之外,所以只可能是聚合文本。但是链文本与原本文一道构成一个更大的文本,在大文本中,它又是组合

文本。

本文认为,“先/后文本”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分别归入前文本和后文本,“同时文本”可以根据内容分别归入上述文本的某一个文本,“链文本”实际上可以看作对所有伴随文本的一个总括,也可以弥补那些不能被其余类型概括的某些遗漏。这些类型的文本,归纳入聚合轴还是归纳入组合轴,取决于我们的视点和视域。

#### 四、组合文本与聚合文本的互相转化

聚合文本与组合文本,并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界线,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什么时候将其看作聚合文本,什么时候看作组合文本,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和解释。

从定义上看,伴随文本之所以叫伴随文本,正是因为它们是附加因素,并不是文本的一部分,所以它们就不可能存在于文本的组合轴上。它们只是文本的框架、形式、来源、延展、解释、相关因素等。从时空关系方面看,伴随文本存在于文本的时空之外,在时间上存在于文本时间之前或之后,在空间关系上存在于文本所在空间之外。从叙述的分层方面看,伴随文本处于叙述层和被叙述层之外。这在“深层伴随文本”的概念中能够更容易被解释清楚。赵毅衡认为,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揭示的“意识形态的沉默话语”、萨义德的“对位阅读”揭示的“文本与作者排除在外的内容”,以及克里斯蒂娃的“生成文本”都是深层伴随文本的内容,深层伴随文本就是意识形态或某一次意义显现。<sup>159</sup>因此深层伴随文本不是文本呈现的内容,而是文本不呈现或没有呈现的内容,在意义解释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深层伴随文本是更典型的聚合文本。既然所有伴随文本都是聚合文本,那么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再分出一个组合文本的类别呢?

正如索绪尔所言,聚合轴是杂乱的、“没有一定的数目,又没有确定的顺序”,它只是组合轴的可能。所以聚合文本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本,它只是文本的各种可能性的杂乱堆积。在解释过程中,聚合轴上的各种可能元素,必然现实化才可能对文本进行有效的意义解释。当聚合轴上的元素现实化之后,它只有被纳入文本之中,成为文本的一部分,才可能对文本意义产生切实的影响。每一次解释,都是聚合文本中的某些元素现实化为组合文本的结果,而每一次解释结果,又再次退入聚合轴成为一个备选材料。这

正是意识解释文本的动态运作方式,是“诗无达诂”的原因,也是文化累积的基本方式。文本的一个解释只是一次聚合文本的暂时组合,一个暂时组合的解释只是为聚合文本增加一个新的杂乱元素。从皮尔斯的三元符号观的角度来看,“符号对其使用者或阐释者所产和的效果,有着特别的三元关系”<sup>[15]101</sup>,符号—对象—解释项的三元关系移用到文本解释过程之中同样有效。文本—意义—解释三元关系也使文本具有无限衍义的特征,而聚合文本与组合文本的动态转化关系,正是通过解释使意义增值的原始动力。

综上所述,将伴随文本区分为聚合文本和组合文本就切实可行。聚合文本是杂乱的伴随文本,而组合文本是暂时的伴随文本。伴随文本可以有聚合性和组合性两种状态。但是有些伴随文本偏向于组合化,例如副文本,因为它在文本中有比较固定的显现形态,就更像组合文本。然而,副文本也是可以换的,换个封面包装,换个笔名发表,“绣像小说”换个图片插入,换个名人做序,都可能暂时影响到文本的解释。有些文本更偏向于聚合化,例如评论文本。然而,评论文本也完全可能组合化,甚至成为文本的一部分,例如脂评本《红楼梦》、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评论文本与原文本一起印出来,就像文本的一部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们还有必要区分观念上的组合文本和形式上的组合文本,同时还要区分观念上的聚合文本和形式上的聚合文本。如上文所述,有些伴随文本,在形式上与文本组合在一起,但是在观念上仍然是聚合文本,例如脂评本《红楼梦》中的评语,各类副文本框架、文本中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等。有些伴随文本,在形式上是聚合文本,但是在观念上却是组合文本,例如“另小说”,先讲一个故事,然后说这个故事不算,重新讲一遍,在形式上是聚合关系中的两个文本,但是在观念中却是一个组合文本。属于这一类别的还有各种类型的元小说,元叙述部分看似对叙述的评论,其实是故事的一部分。

伴随文本与文本处于不同的世界之中,但这只是观念上的。在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中,叙述文本与伴随文本并没有这种绝对不相融的关系,而

是恰恰相反,文本和伴随文本互为存在的前提,并且各自为对方提供存在性的证明。聚合文本与组合文本的区分,是观念上的区分,这样区分的目的,是为叙述文本找到一个证明其存在性的框架,将其与实在世界的再现框架区别开来。叙述的区隔框架,就是一个由各种伴随文本围合而成的作者与读者共在的世界。此框架在区分纪实性与虚构性、真实性与虚假性这些重要概念的时候将发挥作用。此区隔框架的闭合与展开,致使虚构世界与实在世界在交融中不断互相充实,成为推动文化发展的基本动力。

#### 参考文献:

- [1] Allen, Graham. Intertextuality[M]. Routledge, 2011.
- [2](英)海沃德. 电影研究关键词[M]. 邹赞,孙柏,李玥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3] Worton, Michael, and Judith Still, eds. Intertextuality: theories and practices [M].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 Vannini S.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Author [J]. Strumentieritici, 2006, 21(1): 1-16.
- [5] 赵毅衡. 符号学[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6] 威尔海姆·莫利希. 非洲语言分类中的普遍问题[J]. 罗慎仪,译. 第欧根尼,1988(2): 66-79.
- [7](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M]. 高名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8]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 [9] 金宏宇. 文本与版本的叠合[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 [10] Genette G. The architext: An introduction [M].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11] Widdowson H G. text, context, Pretext: critical Issu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M]. John Wiley & Sons, 2008.
- [12](法)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 文本发生学[M]. 汪秀华,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13](西班牙)塞万提斯. 堂吉诃德(上)[M]. 杨绛,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14] Popovi · A. Aspects of metatext [J].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Revue Canadienn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1976, 3(3): 225-235.
- [15](英)利布利·劳特利奇. 符号学指南[M]. 周劲松,赵毅衡,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郑迎文]